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學論稿

姜亮夫 著 姜昆武 柴劍虹 常蓋心 編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學論稿

姜亮夫 著 姜昆武 柴劍虹 常蘊心

編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敦煌學論稿 / 姜亮夫著；姜昆武，柴劍虹，常蓋心
編.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4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 柴劍虹，張涌泉，
劉進寶主編)

ISBN 978-7-308-16551-8

I. ①敦… II. ①姜… ②姜… ③柴… ④常…
III. ①敦煌學—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314347 號

敦煌學論稿

姜亮夫 著
姜昆武 柴劍虹 常蓋心 編

出 品 人 魯東明
總 編 輯 袁亞春
叢書策劃 黃寶忠 宋旭華
責任編輯 胡 畔 (llpp_lp@163.com)
責任校對 宋旭華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興邦電子印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4.625
字 數 367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6551-8
定 價 42.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中心聯繫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hs.tmall.com>

總序

浙江，我國“自古繁華”的“東南形勝”之區，名聞遐邇的中國絲綢故鄉；敦煌，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便成為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會”。自唐代始，浙江又因絲綢經海上運輸日本，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浙江與敦煌、浙江與絲綢之路因絲綢結緣，更由於近代一大批浙江學人對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的研究、傳播、弘揚而令學界矚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榮昌盛，學術底蘊深厚，在時代進步的大潮流中，涌現出衆多追求舊學新知、西學中用的“弄潮兒”。20世紀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流散而興起的“敦煌學”，成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者首先“預流”者，即是浙江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國學大師“導夫先路”，幾代浙江學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奮隨其後，薪火相傳，從趙萬里、姜亮夫、夏鼐、張其昀、常書鴻等前輩大家，到王仲犖、潘絜茲、蔣禮鴻、王伯敏、常沙娜、樊錦詩、郭在貽、項楚、黃時鑒、施萍婷、齊陳駿、黃永武、朱雷等著名專家，再到徐文堪、柴劍虹、盧向前、吳麗娛、張涌泉、王勇、黃征、劉進寶、趙豐、王惠民、許建平以及馮培紅、余欣、竇懷永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學術追求，也有各自的學術傳承與治學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學科園地辛勤耕耘，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發展與絲路文化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浙江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者，成為國際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研究領域舉世矚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學術群體。這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始創於 1897 年的浙江大學，不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淵藪，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英才輩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貫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腳踏實地而又敢於創新的學者專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的浙江學人而言，不僅相當一部分人的學習、工作與浙江大學關係緊密，而且每每成為浙江大學和全國乃至國外其他高校、研究機構連結之紐帶、橋梁。如姜亮夫教授創辦的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1983 年受教育部委託，即在全國率先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培養了一批敦煌學研究骨幹；本校三代學者對敦煌寫本語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在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浙江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精誠合作，在運用當代信息技術為敦煌石窟藝術的鑒賞、保護、修復、研究及再創造上，不斷攻堅克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原語言文學分會基礎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也已經成為與甘肅敦煌學學會、新疆吐魯番學會鼎足而立的重要學術平臺。由浙大學者參與主編，同浙江圖書館、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編撰的《浙藏敦煌文獻》於 21 世紀伊始出版，則在國內散藏敦煌寫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領跑與促進的作用。浙江學者倡導的中日韓“書籍之路”研究，大大豐富了海上絲路的文化內涵，也拓展了絲路文化研究的視野。位於西子湖畔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則因其獨特的絲綢文物考析及工藝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并以它與國內外眾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機構進行實質性合作取得的豐碩成果而享譽學界。

現在，我國正處於實施“一帶一路”偉大戰略的起步階段，加大研究、傳播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這對於今天的浙江學人和浙江大學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傳承、發揚學術優勢的問題，也是以更開闊的胸懷與長遠的眼光承擔的系統工程，而決非“應景”、“趕時髦”之舉。近期，浙江大學創建“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絲路文明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的堅實步伐。現在，浙江大學組織出版這一套學術書系，正是為了珍惜與把握歷史機遇，更好地回顧浙江學人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歷程，奉獻資料，追本溯源，檢閱成果，總結經驗，推進交流，加強互鑒，認清歷史使命，展現燦爛前景。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委會

2015年9月3日

出版說明

本書系所選輯的論著寫作時間跨度較長，涉及學科範圍較廣，引述歷史典籍版本較複雜，作者行文風格各異，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歷史、尊敬作者、遵循學術規範、倡導文化多元化的原則，經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協商，書系編委會對本書系的文字編輯加工處理特做以下說明：

一、因內容需要，書系中若干卷采用繁體字排印；簡體字各卷中某些引文為避免產生歧義或詮釋之必需，保留個別繁體字、異體字。

二、編輯在審讀加工中，只對原著中明確的訛誤錯漏做改動補正，對具有時代風貌、作者遣詞造句習慣等特徵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歷史地名、族名等稱呼，只要不存在原則性錯誤，一般不予改動。

三、對著作中引述的歷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處明確，核對無誤，原則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動。原著沒有注明版本出處的，根據學術規範要求請作者或選編者儘量予以補注。

四、對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魯番所出古寫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規範簡體字或繁體字，如因論述需要，也適當保留了

一些原寫本中的通假字、俗寫字、異體字、借字等。

五、對著作中涉及的書名、地名、敦煌吐魯番寫本編號、石窟名稱與序次、研究機構名稱及人名，原則上要求全卷統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體現時代特色或學術變遷的，可括注說明；無法做到全卷統一的則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書系編委會

目 錄

我與敦煌學	(1)
敦煌學論文集序	(5)
敦煌學概論	(9)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9)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25)
第三講 敦煌經卷簡介(上)	(41)
第四講 敦煌經卷簡介(下)	(57)
第五講 敦煌藝術內容簡介	(77)
第六講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88)
敦煌——偉大的文化寶庫	(111)
自 序	(111)
一 敦煌簡史	(140)
二 敦煌石室	(145)
三 敦煌學	(156)
四 敦煌學在中國學術上的價值	(169)
五 敦煌的造型藝術	(194)
六 敦煌的佛教經典	(215)
七 敦煌的道家經典	(225)
八 敦煌的儒家經典	(235)
九 敦煌的史地材料	(248)

十 敦煌的語言文學材料	(260)
十一 敦煌的科學材料	(278)
參考五十則	(284)
敦煌經卷在中國文化學術上的價值	(311)
一 佛 經	(313)
二 道家經典	(316)
三 儒家經典	(317)
四 韻書發現	(320)
五 文 學	(321)
六 史 學	(323)
結 尾	(325)
瀛外將去敦煌所藏韻書字書各卷敍錄	(326)
吳彩鸞書切韻事辯及其徵信錄	(362)
敦煌小識六論	(374)
一 敦煌藝術之變化	(374)
二 莫高窟小識	(382)
三 藏經洞與經卷	(386)
四 敦煌經卷	(387)
五 道教經典	(389)
六 敦煌雜識	(391)
讀王靜安先生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	(395)
羅振玉補唐書張義潮傳訂補	(399)
一	(399)
二	(407)
三	(412)
四	(420)
敦煌造型藝術	(423)

一 畫	(423)
二 塑 像	(436)
敦煌學必需容納的一些古蹟文物	(439)
一 漢晉竹木簡	(440)
二 絹與紙	(444)
三 軍用器物	(445)
四 雜 器	(445)
後 記	(447)

我與敦煌學

在成都讀書時，先生講中國歷代的書厄，孔壁、汲冢是我們很注意的發現。敦煌也發現大批文物，雖然也第一次聽見了，然而不很在心，只在讀詞時，先生介紹過《彊村叢書》中的《雲謠集曲子詞》，說是敦煌出土的。到了清華，接觸漸多，尤其是靜安先生，經常要介紹羅振玉印行的書，到圖書館借讀，也不過視為一種難得的資料，在我寫《尚書新證》時，從《涵芬樓秘籍》中，借讀過《堯典釋文》殘卷，漸漸有些認識，此後在一切研究中，往往也借點這類印本來參照一下。

在巴黎遇舊友王重民，他正在國民圖書館繼續編伯希和的敦煌卷子目錄。他同我說，有些關於韻學的卷子，邀我去看，到我自己發現陸法言《切韻》諸卷，及《道德經》、《詩經》卷子，覺得極有價值，於是貪看下去，繼而攝片、抄錄、影寫，都幹得起勁，每天去國民圖書館寫本部借卷子，早出晚歸，只有敦煌卷子，忘了一切。向覺民先生在倫敦知道了，也寫信要我去倫敦看英國博物館的卷子，同時我在一些博物館，也盡量攝影像片，於是這條繩子，愈拉益長益緊，我拋棄了學習考古學的計劃，如瘋似狂的抄、攝。等到歸國前，共得其他文物藝術製片千餘張，敦煌製片四百餘張。七七事變前三日，由西伯利亞從虎口逃到北京，悲感極多，而千餘張文物藝術製片，在八一三後逃難中，損失幾盡。曾寫出的一篇《歐洲訪古記》曾寄《國聞周報》而未發表也遺失了，僅僅剩得敦煌製片三百張不到一點，更加珍惜。這三百張製片，對我有種最大的

壓力，在日寇侵華到處飛機轟炸，至為兇殘的情況下，覺得整理這點點個人所得的遺產，成了我不容推諉的責任。在這個惶恐哀傷的時日，上戰場殺敵不可能，把殺敵精神，用在對敦煌經卷研究的拚搏上去，是我在抗戰中的“責任”。于是第一步把所得的卷子，分類寫成個總目，將按此總目作研究。于是預備了一些參考書，陳垣的北京圖書館所藏卷子總目，伯希和目，斯坦因目，大谷光瑞目，從頭一一檢看。最多的佛經，確是我最難的對手。于是先弄一下佛教經典目，尋了略近十種《大藏經》目，做一個總目，來與陳、伯、斯、大等目對勘，又把三種《高僧傳》也做了一份總檢目，前前後後，這等工具都弄好了，我才在三百餘種目中，選定先後整理計劃，因為材料是語音部分比較全，所以從韻書入手，又把王靜安先生與劉半農君所錄切一、切二、切三及王仁昫《切韻》，與我的原卷，細細校對一番，使我打下了對卷子的是非得失認識的基礎，才開始作研究。而研究開始前，非得將卷子整理清楚不可，這是最最初步的工夫，所以用了一年半的工夫，親自抄寫了一份清稿。原來我在國民圖書館閱讀時，有幾種方法、方式：（一）是抄錄全稿。（二）是攝影影片。在抄錄中為清正時着想，所以針對原卷情況，用了三套寫法：（一）是照抄原文。（二）是用透明紙影寫匡格、版心及其殘斷的痕跡，而在四邊配上大字。即主要字，而非註語、反語等等。（三）是詳細記錄了每一紙的詳細情況。到這次清正時，先請兩個學生，將匡格一紙，先描繪于正式紙上，將我的抄片，點點滴滴配抄在上面，而要時時參證我的記錄。我然後用這個學生抄片，細細與影片核對無誤，又把殘痕配入。然後用正式清寫的夾紅連土紙，影寫在這個抄片上，親自一筆一劃的描寫文字、殘痕。每一張清正本，至少花了八至九次的工力，花了八九張大紙。所以清正本，可能是第九張。我真是不惜代價——我的目力的代價。每天除授課外，平均八至十個小時，安排在這份清

本上，大概是二天半至三天清寫出一張來。（在法、英抄寫時，有件至今以爲耿耿的事。是卷子上有塵灰糊滿的，用老人牌刀片，輕輕的刮，刮不了的，用口液一點點輕貼一下，看出來一個字，寫一個字，往往一天只能寫二三行，到全部摹印完畢後，我的近視增加了六百度。）我又繼續爲各卷作考證。主要是考定了陸法言《切韻》這個系統的各種應考事件，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韻部分合，把這二十多種韻書弄完，于是今本《廣韻》的母本，亡失了千餘年的陸詞《切韻》，算是恢復了，替文化史上復活了一種重要典籍，命名爲《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我也自取一個齋室名爲成均樓。隔了近二十年，在上海印行。但令人非常歉咎的是論部、譜部兩部分，由於我正在重病，出版時的清本，是由一位農村來的青年爲寫的，他文化水平不高，當時我病，未曾親校，所以多有錯誤，預備重版時，一一改正，以釋咎意。後來日本及我國臺灣、香港等地區，都曾把這個原本翻印過去，所以我們雖只印六百部，而這三處翻印的確在數萬部之多。

接着我把其餘部分，並加入了些莫高、榆林兩窟的藝術材料，編成一部《敦煌學志》，一面我把其中若干卷材料，凡友輩願爲之考證者，各爲之研究一二卷。其中已有成果者，有蒙文通的《老子研究》，金毓黼的《唐令品考》，徐仁甫的若干卷《切韻》考，而唐文播君于《老子》用功至勤，我更根據這些文章，重加整理，成了《道德經綜考》。我內子陶秋英，我也請她協助。她爲我整理了《諸韻書正俗字譜》及《釋氏》、《寫生、經生》、《寺觀》三錄。這些文章，統統收入了我的《敦煌論文集》、《瀛涯敦煌韻輯》與《莫高窟年表》三書中。但《敦煌志》一書，一則分量不小，一則有些部分在昆明時被友人、學生借閱，頗有遺失，所以解放後，我把它分裂成爲《文化寶庫》及若干種待印稿本。

我自己細細審視我的這些業蹟，大抵成于教學餘暇之時，亂

離逃竄之中，到現在，偶而翻到，很願能有餘力，一一爲之清寫，爲之核對，爲之改正，但同時又覺得手邊還有很多材料，也應一一交給人民才是。譬如我的古代史、近代學術史、漢語語言、文字學等，真正我心甘情願搞的“活路”，全部都還在睁着眼等着我。我又怎樣辦？因而自己原諒，只要勉強有七八成，勉強拿得出，姑且拿出，與國人共究之，所以有許多，只能說是種“工具”，也出籠了，對未來研究，也起些作用，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會偷懶，但求少些干擾，可能多點成就，如此而已。

我與敦煌學關涉的事還有不少，但平列一些事象，有什麼好處呢！我無做一個敦煌學專家的野心。我只是一個“但開風習不爲師”的人而已。所以謹就寫成《瀛涯敦煌韻輯》一書的編寫經過，用來作研究此學的一個方法方面的參考。

敦煌學論文集序

余旅法之次年，遊覽巴黎八十餘所博物館及諸藏室殆遍，多見故國文物珍貴，遂發奮重選可貴者，攝影記錄得三千餘件，寫訪古記萬余言寄《國聞周報》，此時友人王君有三，為法國國民圖書館續編伯希和 P. Pelliot 所得敦煌卷子，時時為余稱頌，促余參此一盛業，相約以韻書字書為主，余遂排日往國民圖書館寫本部，宣讀卷子。後遂泛于全部經軸，得影本抄本及記錄約四百餘卷。此時向覺民君在倫敦為北京圖書館製敦煌卷子，余因就向君處求翟里斯借讀諸故書儒道經卷凡得百餘卷，一依例寫之，中間亦去柏林、羅馬，所得甚少，無可觀者。

盧溝橋事變之前三日，余自歐洲歸北京，與故都舊友相會。八一三上海難作，余方曝書于蘇州干將坊，十九日蘇州空城避敵人飛鳶，旅舍促余離去，無所歸，因思入滬。車至真如停不前，親見敵機炸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即電話詢滬中友人請為察看寶山路藏書，正延燒不可知矣，數周不熄，則素日節衣食所得舊籍二萬卷成灰燼矣。將斷炊，乃受東北大學之聘，于白下藍家莊友人家，勉攜兩篋殘稿，匆匆渡江至西安，急求中國旅行社，代運蘇之居停主人鮑姓干將坊所曝書，社復電同意，不意主人周折，此八千餘卷校好書冊稿件亦耗矣。琴書飄零，無以為生。次年與新婦賃三台北山下樓屋二間，無所事，惟歐洲所得敦煌各種經卷幸得隨，乃日伏長廊中，與妻相對嘒啄，三年成《韻輯》二十四卷，《經籍校錄》六卷，《敦煌文錄》四卷，《莫高資料編年》十二卷，《敦煌

志》十卷(後解散爲通俗讀物曰《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等六種,及別成《敦煌識小錄》六種,吾妻養病檐前,憐余勞,爲錄成書曰:一、《隋唐宋韻書正俗字譜》,二、《敦煌釋氏錄》,三、《經卷題名錄》,四、《敦煌寺名錄》,五、《敦煌寫生錄》,六、《唐五代敦煌坊巷錄》。一九四〇年移硯昆明,與清華、北大舊友相值,有商量之樂,遂又輯不入上列各書之單篇論著爲《論文集》,先後得二十餘篇,又求之通人,爲考研各卷,如蒙文通之于《老子》,金君毓黻之爲《唐官令品考》,徐君仁甫爲《諸韻書卷子考》,而學友唐文播校《老子》最謹嚴,皆輯爲論文,凡收文八篇共爲《論文集》。余行能無似,徒以勞瘁于此種故紙堆中之事當有了時,此一集可謂了一事矣。此爲余敦煌學之第一次結集,甲申六月,時在昆明翠湖畔。

乙卯冬,女兒自富陽歸,“吾儕相對復三人”,女樂依膝下,爲整齊插架書籍,遂發奮爲余編次所著書,自覺關涉敦煌者雜而多端,遂商量重排舊稿,其可類者類之爲一書,計得完稿九種,《敦煌文錄》大殘,然尚有目可尋,惜之亦附之,定爲《敦煌十書》,非謂其專於此而有大獲,實則敝帚自珍,且余一生精力,憔悴于此,世有知者,或能爲壽之棗梨。私以爲亦可作學術鼓吹,亦所甚願也,不然則藏之以待後之知吾書者。十種計:(一)《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已印,(二)《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已印,(三)《瀛涯敦煌經籍校錄》四卷,(四)《莫高窟年表》十二卷,(五)《瀛涯敦煌雜錄》,(六)《敦煌學論文集》四卷,(七)《敦煌識小錄》五種,(八)《敦煌隨筆》,(九)《王國維劉復兩先生所錄倫敦巴黎藏原寫本切韻校記》九卷,(十)《敦煌文錄》。此次結集,近似誇飾,其實則大病之後,恐不能永世,自爲總結,其情至可悲也。

十年動亂余損失甚重,即以此論文集而論,余所最重視《翟奉達傳》、《尚書堯典殘卷疏證》、《漢魏毛詩音考》、《唐末五代敦